

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朱超 易祯 李超

内容提要:民主程度通过国家制度影响“人”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从而释放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本文针对1960—2015年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民主程度在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体现出放大器机制。这一研究结论在不同时间区间和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中稳健成立,也不受人口变量和民主程度变量选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对中国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关键词:民主程度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7)10-0014-12

一、问题提出

世界人口形势正在发生系统性的改变,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也会带来未来人口变量的深刻变化。而民主程度反映一国公民政治权利,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影响经济主体“人”的行为。各国都希望通过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更注重释放经济主体“人”的潜力,从而推进经济发展。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制度基础,其促进作用是巨大且不可替代的。

第一,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现有研究中,人口红利的概念可概括为四类:储蓄论、资本深化论、人口结构论和行为调整论^[1]。人口红利可能通过三条渠道刺激经济增长。(1)缓解人口抚养负担,提高劳动力绝对数量。林德和马伦贝格(Lindh & Malmberg,1999)认为人口红利能降低家庭抚养负担,劳动人口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社会生产性活动,间接增加社会劳动力数量和比例^[2]。康宁(Canning,2006)发现较低的少儿抚养负担也能够解放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提高劳动市场参与率并促进经济增长^[3]。(2)提高储蓄率。

收稿日期:2017-04-17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1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TDJJD201512)

作者简介:朱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70;

易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李超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职员,北京,100038。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年和老年时期进行负储蓄,抚养比与储蓄率反向变化。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莱夫(Leff, 1969)^[4]、希金斯和威廉姆森(Higgins & Williamson, 1997)^[5]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3)降低财政支出。泰尔斯和史(Tyers & Shi, 2007)认为老年抚养比上升带来税收减少和财政支出增加,这两方面的压力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6]。而人口红利则可能有效降低财政负担,从而将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的生产行为上。

第二,民主程度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部分学者认为民主程度提高能够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并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佩尔松和泰贝里尼(Persson & Tabellini, 2006)针对1960—2000年150个国家、习明明和张进铭(2014)针对1972—2010年1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均发现,民主制度能够推动经济发展^[7-8]。而巴罗(Barro, 2003)、普朗普和马丁(Plümper & Martin, 2003)对于二者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则表明,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民主程度较低时,民主化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民主达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提高民主程度将产生阻碍作用^[9-10]。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民主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可能通过三条间接渠道发挥作用。(1)经济自由化。菲德尔穆茨(Fidrmuc, 2003)发现民主程度提高更有利于推进经济自由化,而后者能够刺激经济增长^[11]。(2)人力资本积累。鲍姆和莱克(Baum & Lake, 2003)发现推进民主能够有效提高贫穷国家的健康程度和富裕国家的受教育程度,从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刺激经济增长^[12]。(3)政治渠道。诺斯(North, 1993)、里维拉-巴蒂斯(Rivera-Batiz, 2002)、德哈恩和斯特姆(De Haan & Sturm, 2003)、特鲁等(Drury et al., 2006)分别认为民主程度能够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质量、限制寻租行为和减少腐败,从而减少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实施促进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阻碍^[13-16]。总体来说,塔瓦雷斯和沃克其尔格(Tavares & Wacziarg, 2001)认为这部分研究结果并没有非常统一^[17]。

第三,民主程度促进人口红利的释放。格林(Glyn, 1995)、塔瓦雷斯和沃克其尔格(2001)、多克阿格斯和鲁巴索格鲁(Doucouliaqos & Ulubasoglu, 2008)、奥尔森(Olson, 1991)认为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将充分就业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为居民储蓄和投资提供安全的制度环境以及降低财政的非生产领域支出作为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都有利于促进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17-20]。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直接讨论民主程度对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讨论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在民主程度较高的样本中,经济增长对抚养比变化更为敏感,这在民主程度变化时期也成立;第三,在极端经济发展程度和不同时间的样本中,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更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本文与现有研究文献的不同之处是,研究并发现民主程度能够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是对政治学、人口学 and 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次尝试。这也有助于在人口结构和民主程度均发生显著变化的中国寻找和关注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政策,对中国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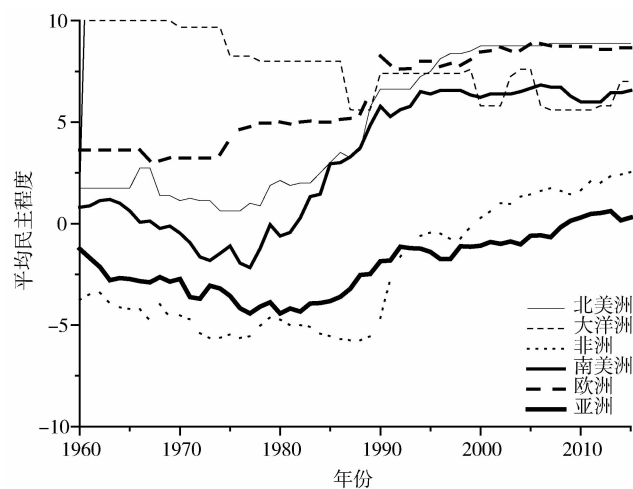
二、典型事实

(一) 民主程度

政治体制、历史沿革、文化等差异,使得世界各国和地区制度开放程度参差不齐。图1用Polity IV数据

库中的 Polity2 指标描绘了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主程度分布情况。以 Polity2 指标中的“民主”项减去“集权”项的得分衡量国家民主程度,取值区间为[-10,10]。“民主”项从政治参与程度、选举竞争程度、选举公开程度和对领导人的约束程度等四个方面对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程度进行评价,“集权”项根据政治参与程度、选举竞争程度、对领导人的约束程度、政策调整的民主程度和竞争公平程度等五个方面评价民主程度。Polity2 指标取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

民主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并且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较为发达的国家民主程度较高,南美洲、南亚和非洲国家次之,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最为保守。从目前跨国收入分配格局来看,更高的民主程度对应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8]。



资料来源:Polity IV数据库。

图1 世界民主程度分布图

(二) 民主程度、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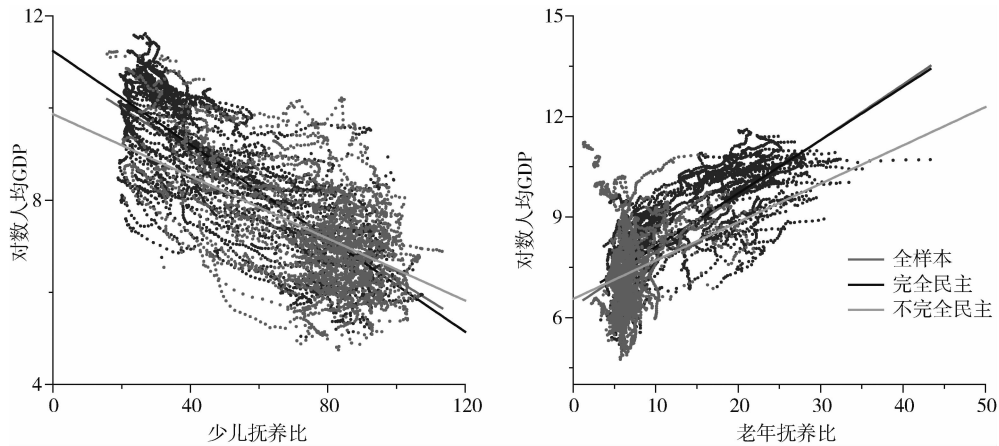
图2描绘了1960—2015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考虑不同民主程度时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可以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与收入水平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并在制度较为开放国家和地区边际影响更为明显。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以解放“人”的经济增长作用为基础。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裕。此时如果辅以有效促进劳动力参与生产的制度安排,则能够有效释放人口红利。已有研究发现,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将充分就业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为居民储蓄和投资提供安全的制度环境以及降低财政的非生产领域支出作为政策目标。从而本文提出假设: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民主程度对这一促进效应产生放大作用。

三、模型和数据

(一) 模型

本文基于经验事实建立计量模型,以验证上面假设。解释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民主程度和人口红利的变量,用于讨论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类是控制变量,用于排除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对实证结果



注:本文根据 Polity IV 数据库的分类标准,将 Polity2 指标大于等于 5 的样本视为完全民主,其余为不完全民主。
资料来源:Polity IV 数据库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时间区间:1960—2015 年。

图 2 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g_{it} = \alpha_0 + \alpha_1 DR_{it} + \alpha_2 DEMO_{it} + \b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_{it} \quad (1)$$

式(1)中, g_{it} 表示经济增长, DR_{it} 表示人口红利, $DEMO_{it}$ 表示民主程度, X_{it} 为控制变量矩阵; α_0 、 α_1 、 α_2 为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系数, β 为控制变量参数矩阵;扰动项由 μ_i 、 λ_t 、 v_{it} 三部分组成,其中 μ_i 为个体异质性截距项, λ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v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

式(1)中的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 g_{it} 以人均 GDP 增长率刻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人均 GDP 增长的上升,从而人均 GDP 增长可以度量经济增长^[1]。

解释变量中的人口红利变量以抚养比刻画。人口红利表现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参考钟水映和李魁(2010)^[1]的研究,本文分别以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14岁及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度量人口红利。

民主程度 $DEMO_{it}$ 选择 Polity IV 数据库中的 Polity2 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历史沿革、执政方针和政治性质不同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民主程度存在差异,民主程度的量化也因此成为研究焦点。目前学者使用较多的民主程度量化指标包括 Economist 杂志发布的民主指数、Freedom House 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和 Polity IV 数据库中的 Polity2 指标。本文借鉴布罗兹(Broz,2002)^[21]、森鲍(Shambaugh,2004)^[22] 和刘晓辉(2013)^[23] 的研究,采用 Polity IV 数据库中的 Polity2 指标量化国家和地区民主程度。Polity2 指标取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也将在后文使用 Freedom House 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检验结果是否在变量度量指标选取中稳健。

控制变量矩阵用于消除宏观经济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及其变形,经济增长受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的影响。为消除完全多重共线性,不考虑消费变量。生产过程中,产出水平受资本和劳动力的共同影响。因此, X_{it} 中包含初始人均资本存量、投资、政府支出、进口和出口。

参考巴罗(Barro,1991)^[24] 的研究,本文引入人均 GDP 一阶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以处理经济发展程度

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和民主程度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巴罗(2003)^[9]认为短期内投资率上升会提高稳态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实现经济增长。本文参考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25]的做法,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刻画投资率。

卢卡斯(Lucas,1998)、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0)认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产业专业化、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刺激经济增长^[26-27]。但是由于进口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者不同的角色,本文分别以进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和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1)。

考虑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汪伟(2009)认为短期内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均无法实现完全折旧,因而经济活动具有跨期性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对上一期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依赖^[28]。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也可以将静态模型转换为动态模型。

(三)数据

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60—2015年。借鉴朱超和张林杰(2012)^[29]的处理方法,对全球数据进行如下筛选:第一,剔除关于某变量数据完全缺失的国家和地区;第二,剔除数据不可得的国家和地区;第三,剔除连续观察值小于5年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选定了15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宏观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民主程度数据来自Polity IV数据库。此外,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在回归过程中剔除了人均GDP增长率的离群值。表1展示了回归模型中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说明
人均GDP增长率	5 105	2.243 3	3.918 5	-13.036 2	14.283 6	百分比(%)
总抚养比	5 097	68.534 3	20.039 2	17.031 2	113.058 0	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
少年抚养比	5 097	56.877 3	25.176 9	15.792 6	107.478 0	14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
老年抚养比	5 097	11.656 9	6.994 2	1.238 5	43.323 9	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
民主程度	4 964	3.384 7	6.832 2	-10	10	Polity IV数据库中的Polity2指标
人均GDP	5 105	11 464	16 099	130	110 001	总人口与当年GDP比值
投资率	4 952	23.467 2	9.031 8	-2.424 3	158.507 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GDP的比例
人均政府支出	5 105	2 193	3 281	3.913 0	19 231	政府总支出对数值
进口占GDP比重	5 094	38.591 2	26.203 5	3.644 9	368.181 0	进口总额与当年GDP的比值
出口占GDP比重	5 094	33.979 3	24.723 8	2.524 6	230.269 0	出口总额与当年GDP的比值

(四)估计方法

静态模型使用固定效应(FE)估计。在进行静态面板估计时,不控制人均GDP增长率滞后项,以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动态模型使用广义矩估计(GMM)估计。为了提高估计效率,布伦德尔和邦德(Blundell & Bond,1998)^[30]结合DIF-GMM和Level GMM的优势,提出了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该方法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GMM估计,可以有效提高估计效率,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模型需要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分析动态式(1)。

四、估计结果

(一) 基本估计结果

利用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式(1),回归结果报告于表2。静态面板模型可以分为混合回归、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随机效应进行估计。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样本数据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参照Polity IV数据库的分类标准,将Polity2指标大于等于5的国家视为完全民主国家(地区),其余视为不完全民主国家(地区)进行回归。表2中列(1)和列(4)为全样本回归结果,列(2)和列(5)为完全民主样本回归结果,列(3)和列(6)为不完全民主样本回归结果。

表2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总抚养			少儿和老年抚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总抚养比	-0.063 5** (0.025 9)	-0.118 6*** (0.021 1)	-0.030 5 (0.049 1)			
少儿抚养比				-0.069 1** (0.029 5)	-0.153 6*** (0.026 1)	-0.027 8 (0.046 9)
老年抚养比				0.136 6* (0.082 2)	0.170 3** (0.073 2)	0.116 5 (0.370 4)
民主程度	-0.024 5 (0.032 8)	0.113 7 (0.160 5)	-0.019 2 (0.094 7)	-0.032 8 (0.034 5)	0.037 0 (0.156 6)	-0.015 0 (0.090 5)
人均GDP (<i>t</i> -1)	-2.789 8*** (1.044 0)	-4.366 0*** (0.894 9)	-2.909 2 (2.167 8)	-3.401 9** (1.345 3)	-6.143 3*** (1.054 9)	-2.954 5 (2.298 6)
投资率	0.247 8*** (0.038 0)	0.216 5*** (0.032 6)	0.291 0*** (0.041 8)	0.265 9*** (0.038 0)	0.260 7*** (0.037 6)	0.293 6*** (0.043 7)
政府支出 (<i>t</i> -1)	-1.646 5** (0.771 3)	-0.610 6 (0.781 0)	-1.989 7 (1.256 1)	-1.734 7** (0.786 8)	-1.045 5 (0.834 0)	-2.004 9 (1.253 5)
出口占GDP比重	0.135 8*** (0.034 3)	0.119 6*** (0.025 8)	0.175 5*** (0.050 9)	0.142 9*** (0.033 5)	0.139 1*** (0.027 9)	0.176 2*** (0.050 9)
进口占GDP比重	-0.061 5*** (0.022 8)	-0.058 1** (0.022 7)	-0.087 3*** (0.029 1)	-0.074 6*** (0.026 1)	-0.083 8*** (0.027 7)	-0.089 7*** (0.033 2)
常数项	32.218 4*** (7.559 4)	44.603 6*** (6.906 0)	27.722 3* (15.113 1)	35.746 0*** (9.677 7)	60.844 8*** (8.788 1)	26.892 8* (14.266 9)
样本数	4 881	2 849	2 032	4 881	2 849	2 032
调整的R ²	0.030 3	0.023 3	0.078 0	0.033 5	0.021 9	0.082 3

注:(1)本文使用STATA/SE 12.0进行程序编写和运算。*、**、***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后同。

在静态模型中,本文的假设得到验证。民主程度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能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上升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在全样本国家(地区)、完全民主国家(地区)和不完全民主国家(地区)均成立。完全民主国家(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大于不完全民主国家(地区),这说明民主程度对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放大效应。还注意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化。可能的原因是:老年抚养比上升伴随储蓄上升,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使得老年人口并没有成为社会真正的抚养负担。

(二) 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需要使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的 AR(1) 和 AR(2) 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数据不适用于 SYS-GMM 方法,而应该使用 DIF-GMM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报告于表3。表3中 Sargan 检验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AR(1) 和 AR(2) 检验不能拒绝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中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和序列相关问题。

表3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总抚养			少儿和老年抚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全样本	完全民主	不完全民主
人均 GDP 增长率	-0.131 8 ***	-0.129 7 ***	-0.130 5 ***	-0.119 8 ***	-0.108 6 ***	-0.128 4 ***
(t-1)	(0.024 1)	(0.027 4)	(0.038 6)	(0.021 9)	(0.025 6)	(0.036 6)
总抚养比	-0.603 7 ***	-0.609 5 ***	-0.496 0 ***			
	(0.088 0)	(0.080 6)	(0.132 0)			
少儿抚养比				-0.701 1 ***	-0.802 1 ***	-0.553 0 ***
	(0.086 2)	(0.088 4)	(0.124 1)			
老年抚养比				1.658 3 ***	1.513 7 ***	2.348 7 **
	(0.348 9)	(0.265 4)	(1.009 1)			
民主程度	0.056 7	0.146 5 *	0.003 2	0.032 7	0.106 4	0.014 4
	(0.051 2)	(0.081 7)	(0.060 4)	(0.048 4)	(0.072 8)	(0.057 3)
人均 GDP	-51.713 5 ***	-43.631 0 ***	-53.530 6 ***	-55.123 5 ***	-50.581 6 ***	-54.378 2 ***
(t-1)	(2.912 6)	(3.055 8)	(3.612 8)	(2.970 2)	(3.349 8)	(3.540 1)
投资率	0.310 6 ***	0.419 3 ***	0.251 4 **	0.311 5 ***	0.411 5 ***	0.251 4 **
	(0.083 9)	(0.071 0)	(0.099 7)	(0.080 9)	(0.067 7)	(0.099 4)
政府支出	2.312 2 **	0.625 4	1.732 2	1.953 6 *	0.147 7	1.623 4
(t-1)	(1.124 1)	(1.971 7)	(1.140 9)	(1.133 8)	(1.796 0)	(1.158 1)
出口占 GDP 比重	0.284 2 ***	0.241 2 ***	0.248 4 ***	0.274 5 ***	0.217 2 ***	0.249 6 ***
	(0.045 4)	(0.049 2)	(0.062 1)	(0.042 9)	(0.045 3)	(0.062 2)
进口占 GDP 比重	-0.159 1 ***	-0.102 0 ***	-0.163 7 ***	-0.159 7 ***	-0.103 6 ***	-0.165 8 ***
	(0.046 2)	(0.036 7)	(0.050 6)	(0.044 6)	(0.035 4)	(0.049 9)
Sargan 检验	0.159 4	0.070 5	0.266 4	0.162 6	0.120 6	0.301 0
AR(1) 检验	0.272 5	0.704 8	0.431 1	0.360 4	0.941 4	0.476 8
AR(2) 检验	0.061 3	0.025 1	0.146 7	0.057 8	0.048 4	0.131 9

注:表中 AR(1)、AR(2)、Sargan 检验给出的结果均为 P 值。

本文假设也在动态模型中得到证明。动态面板估计结果与静态面板结果一致,民主程度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能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上升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在完全民主样本中边际影响更大,民主程度对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放大效应。在动态模型中也注意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化。

(三) 民主程度变化时期的考察

除了民主程度静态取值之外,本文也关注在公民地位发生改变的制度调整时期,收入的年龄效应是否发生改变。表4汇总了民主程度是否发生调整时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4)为民主程度不变样本回归结果,列(2)和列(5)为民主程度提高时,制度更为开放样本回归结果,列(3)和列(6)为民主程度下降时,制度更为保守样本回归结果。列(1)—列(3)为总抚养比估计结果,列(4)—列(6)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估计结果。由于民主程度变化样本连续性较差,动态模型估计结果难以刻画这种非连续效应。因此对静态模型进行估计。表4估计结果发现,即使在制度发生调整的时期,本文的假设依旧成立。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制度变得更为民主的经济体中更大。

表4 民主程度变化时期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总抚养			少儿和老年抚养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总抚养比	-0.058 9 ** (0.025 4)	-0.181 3 *** (0.052 0)	-0.175 4 ** (0.073 3)			
少儿抚养比				-0.064 2 ** (0.028 4)	-0.112 8 ** (0.054 0)	-0.142 3 ** (0.064 6)
老年抚养比				0.093 4 (0.074 5)	1.496 1 *** (0.506 8)	1.197 8 (0.841 1)
民主程度	-0.034 0 (0.033 6)	0.110 9 (0.096 9)	-0.004 6 (0.099 1)	-0.041 7 (0.035 1)	0.120 2 (0.094 4)	0.027 0 (0.099 3)
人均 GDP (<i>t</i> -1)	-2.559 5 *** (0.958 3)	-9.667 6 *** (2.315 3)	-13.220 6 ** (5.103 9)	-3.058 9 ** (1.181 6)	-10.941 2 *** (2.265 9)	-14.909 3 *** (5.135 2)
投资率	0.244 9 *** (0.034 2)	0.279 1 ** (0.116 2)	0.093 2 (0.148 3)	0.260 2 *** (0.033 6)	0.310 7 *** (0.116 1)	0.146 3 (0.151 7)
政府支出 (<i>t</i> -1)	-1.839 9 ** (0.804 4)	0.652 5 (1.457 5)	3.264 4 (2.362 0)	-1.911 6 ** (0.821 5)	0.382 6 (1.406 6)	3.059 0 (2.251 7)
出口占 GDP 比重	0.146 2 *** (0.037 8)	0.019 9 (0.092 0)	0.265 9 ** (0.126 0)	0.152 8 *** (0.036 2)	0.028 7 (0.088 8)	0.253 3 ** (0.124 1)
进口占 GDP 比重	-0.073 8 *** (0.019 8)	0.039 2 (0.107 2)	-0.208 0 ** (0.083 5)	-0.085 3 *** (0.021 3)	0.033 9 (0.105 3)	-0.219 0 *** (0.079 0)

表4(续)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总抚养			少儿和老年抚养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不变	更为民主	更为保守
常数项	31.880 4 *** (6.460 3)	75.013 0 *** (15.951 4)	93.632 9 *** (32.278 8)	34.904 9 *** (8.203 3)	66.366 3 (14.448 7)	93.525 4 *** (30.493 1)
样本数	4 382	337	162	4 382	337	162
调整的 R ²	0.033 6	0.007 6	0.057 1	0.036 2	0.013 8	0.022 7

(四) 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1960—2015年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

第一,民主程度的变化没有表现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民主程度的提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民主程度的提高能够解放社会生产力,完善市场结构,经济个体能够在利润驱使下自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市场经济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较高的民主程度意味着政府拥有较低的经济调控能力,市场失灵时难以有效发挥调整作用,不利于经济发展。德哈恩和西曼(de Haan & Siermann,1995)认为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31]。

第二,人口红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民主程度对其产生放大作用。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下降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不同民主程度国家和地区以及民主程度变化时期均存在。这一结果与布鲁姆和威廉姆森(Bloom & Williamson,1998)^[32]、多克阿格斯和鲁巴索格鲁(2008)^[19]的研究结论一致。完全民主样本和不完全民主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民主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民主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上升,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从而释放人口红利;二是民主程度的变化引起劳动力流动速度发生改变,劳动可以在不同地区内实现优化配置,使得经济能够发现并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第三,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化,老年人口并不一定不构成社会抚养负担。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社会消费水平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使得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对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形成约束^[33]。这两方面的影响可能相互抵消,在本文的样本中表现为老年抚养比上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李军(2006)通过将老年抚养比引入索洛模型,建立了包含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的经济平衡增长路径方程,证明了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既存在正作用效应又存在负作用效应^[34]。在两种效应之间,也存在着“零作用”效应的临界状态。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分组检验、更换变量和更换数据三个角度开展主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一) 分组检验

1. 按照时间分组

本文使用的数据样本区间为1960—2015年,在此期间内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不同历史时期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将全样本按时间分为1960—1979年、1980—

1999年、2000—2015年三个子样本。可发现,按时间分组估计结果中,前有发现均稳健。总抚养比降低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在完全民主样本中边际影响更为明显。

2. 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分组

本文也关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民主程度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发生改变。在全样本中取人均GDP的25%分位点和75%分位点,分别为905.467美元和9923.81美元。将人均GDP低于905.467美元的样本和人均GDP高于9923.81美元的样本分别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即使在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也更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报告。

(二) 更换人口变量

在前文的估计中,利用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刻画人口红利。本文将使用人口占比对前有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人口比例变量代替抚养比,考察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在选取人口变量时保持稳健。结果发现以人口比例代替也不改变原有结论。少年人口(0~24岁)占比下降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民主程度能够方法这一促进作用。25~44岁、45~6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化。

(三) 更换民主数据

现有研究中使用较多的地位和制度量化指标包括 Economist 杂志发布的民主指数、Freedom House 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和 Polity IV 数据库中的 Polity2 指标。前文使用 Polity IV 数据库中的 Polity2 指标作为地位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本部分利用 Freedom House 发布的政治权利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Freedom House 发布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 PR)和公民权利(civil liberties, CL)两个指标,取值范围均为1~7,取值越小,表明民主程度越高。全样本包含191个国家,筛选后为125个国家,样本区间为1972—2014年。参照 Polity IV 数据库的分类标准,本文将 PR 和 CL 指标小与等于2.5的国家和地区视为完全民主样本,其余视为不完全民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化,边际影响在完全民主样本中更大。这与 Polity2 指标估计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在民主程度变量选取中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民主程度这一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结合人口经济学,研究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1960—2015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探寻民主程度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验证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不同民主程度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民主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更为敏感。具体而言:

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表现为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老年抚养比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社会消费水平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使得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对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形成约束。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得老年人口并不一定构成社会抚养压力。老年人口并不一定不构成社会抚养负担。安和乔伊(An & Jeon, 2006)^[33]和李军(2006)^[34]也有相似的发现和观点。这方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在民主程度较高的样本中,经济增长对抚养比变化更为敏感。这在民主程度变化时期也存在,并在不同时间区间、更换人

口变量和更换民主程度代理变量时稳健成立。

第三,在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更为开放的制度更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这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较低的样本中均成立。

经济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民主程度反映一国和地区公民政治权利,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影响经济主体“人”的行为,从而政治制度和人口结构变化均能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研究并发现民主程度能够放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是对政治学、人口学 and 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一次尝试。研究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对于人口红利末期如何释放人口效应也可以提供新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是,人口红利窗口打开,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不断推进。本文的研究和发现也有助于中国在人口结构和民主程度均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寻找和关注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政策,并对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支持。同时,通过改革和民主程度的改善,进一步发挥其对其他要素的放大效应,全方位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参考文献:

- [1]王颖,邓博文,王建民. 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产生机制及研究展望[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2):12-20.
- [2]LINDH T, MALMBERG B. 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 OECD, 1950—1990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9, 12(3): 431-449.
- [3]CANNING D. The economics of HIV/AIDS in low-income countries:the case for preventio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3): 121-142.
- [4]LEFF N H.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5):886-896.
- [5]HIGGINS M, WILLIAMSON J G. 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7, 23(2):261-293.
- [6]TYERS R, SHI Q. Demographic change and policy responses: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economy[J]. The World Economy, 2007, 30(4):537-566.
- [7]PERSSON T, TABELLINI G.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the devil in the detail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319-324.
- [8]习明明,张进铭. 民主、投资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4(4):1485-1512.
- [9]BARRO R J.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3, 4(2):231-274.
- [10]PLÜMPER T, MARTIN C W. Democracy,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a political-economic explanation of the Barro-effect[J]. Public Choice, 2003, 117(1/2):27-50.
- [11]FIDRMUC J. 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3): 583-604.
- [12]BAUM M A, LAKE D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democracy and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3, 47(2): 333-347.
- [13]NORTH D C.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3, 149(1):11-23.
- [14]RIVERA-BATIZ F L.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6(2):225-247.
- [15]DE HAAN J, STURM J E. Does more democracy lead to greater economic freedom? New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3):547-563.
- [16]DRURY A C, KRIECKHAUS J, LUSZTIG M. Corruptio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6, 27(2): 121-136.

- [17] TAVARES J, WACZIARG R. How democracy affect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8):1341 – 1378.
- [18] GLYN A. Social democracy and full employment[Z]. WZB Discussion Paper No. FS I 95 – 302, 1995.
- [19] DOUCOULIAGOS H, ULUBASOGLU M A.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52(1):61 – 83.
- [20] OLSON M.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3):567 – 576.
- [21] BROZ L J. Political system transparency and monetary commitment regim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2, 56(4):861 – 887.
- [22] SHAMBAUGH G E. The power of money: global capital and policy cho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48(2):281 – 295.
- [23] 刘晓辉. 汇率制度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J]. *世界经济*, 2013(2):137 – 160.
- [24] BARRO R 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407 – 443.
- [25] 林毅夫, 孙希芳.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8(9):31 – 45.
- [2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8, 22(1):3 – 42.
- [27] GROSSMAN G M, HELPMAN E. Trade, innovation, and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2):86 – 91.
- [28] 汪伟. 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 *经济学(季刊)*, 2009(1):29 – 52.
- [29] 朱超, 张林杰. 人口结构能解释经常账户平衡吗? [J]. *金融研究*, 2012(5):30 – 44.
- [30]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115 – 143.
- [31] DE HAAN J, SIERMANN C L J.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5, 20(2):197 – 215.
- [32] BLOOM D E,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419 – 455.
- [33] AN C B, JEON S H.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U shape relationship[J]. *Economics Letters*, 2006, 92(3):447 – 454.
- [34] 李军.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经济平衡增长路径[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8):11 – 21.

Democracy,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Economic Growth

ZHU Chao¹, YI Zhen¹, LI Chao²

(1.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2. China Minsheng Bank,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role of people is influenced by democracy in the economic operation of a country through the state system, thereby releas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Using panel data of 150 countries from 1960 to 201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democracy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divide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opulation dividend can significantly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while democracy cannot; (2) democracy can alter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are robust over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cross countries and among different choice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democracy. This study might help promote socialism democracy and fair competition, so as to maximiz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democracy; population dividend;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周 斌